

【台湾故事·名人寻踪之十二】黄土高坡窑洞

□许志杰

——阎锡山故居“种能洞”

从河边村到“种能洞”，阎锡山的岁月过去了；从“种能洞”再到河边村，刻在岁月上的历史清晰可见……

在台北阳明山永公路旁，有一所特别的房屋，它位于路边的山林中，却又半隐半现于山坡之上，猛地一看，与陕甘宁地区黄土高原的窑洞十分相似。是的，这就是一所按照黄土高原民居样式建造的房屋，它的主人是来自黄土高坡、人称“山西王”的阎锡山。追随蒋介石，阎锡山曾经风光一时，被委任为蒋介石政权“行政院院长”、“国防部长”等要职。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，他住在台北丽水街，但是赋闲在野的阎锡山感觉丽水街地处闹市，过于喧嚣，于是，他到台北近郊的阳明山寻地建窝，希望过隐居山林的“野鹤”日子。经过一年的选址建造，第二年，窑洞建成，阎锡山就与家人和部分下属一起搬了进去，从此与外界尤其是政界断绝往来。1960年5月23日，阎锡山病逝，终年77岁。

阎锡山是北洋军阀时期晋系霸主，与同时代军阀不同的是，阎锡山并非一介鲁莽武生。他是清末陆军步兵科举人出身，虽是武举人，但也读过私塾，诵过四书五经、写过大仿，喜欢舞文弄墨。从他留下的墨迹可以看出，阎锡山的书法功底十分厚实，配得上清末举人这个头衔。他还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，1930年5月19日，阎锡山登上了著名的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封面。之前，只有吴佩孚、蒋介石、冯玉祥三位中国人上过《时代》杂志封面。之后的半个多世纪，也只有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宋美龄等17位中国人再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。阎锡山之所以登上《时代》杂志封面，是因为那时候的阎锡山在山西不出山，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政策，给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。《时代》杂志这样写道：他是一位真正的“和平军阀”，作为山西省的“模范督军”，他实际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。2004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山西史纲》一书，对阎锡山

的“独立王国”予以认可。书中这样描述，自1917年9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山西省长开始，他就将山西置于北洋军阀政府之外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自成体系，对外以“保境安民”为由不许外省军队入晋，筑起军事堡垒。阎锡山个人一再表态：“一不入党派，二不问外省事，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，要服从中央命令，要保卫地方治安。”

实际上，后来的阎锡山还是“食言”了，他不仅联合冯玉祥与蒋介石大打对攻战，失败后又心甘情愿地投入蒋介石的怀抱，接受各种委任。当然，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立马翻脸，撸了他的实职，给了一个“总统府资政”的虚职。对蒋介石的为人处世风格了解得门儿清的阎锡山，知道老蒋玩的是什么把戏，干脆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省得惹出是非。阎锡山说：“我到台湾因不耐炎热与暴风雨侵袭，建茅屋于金山麓移居以来，想起内地冬暖夏凉、不怕风雨的窑洞来。”因为想念家乡，于是仿造山西窑洞式建筑，还将房子命名为“种能洞”。阎锡山解释“种能洞”的来由是，他一向以种能观察宇宙，为配合自己的宇宙观而命名“种能洞”。隐居山林，阎锡山在“种能洞”著书立说，阐述自己的大同世界理念。他当年从台北丽水街搬到“种能洞”时，带了一部分跟他从山西老家到台湾的忠实追随者。阎锡山过世之后，他的家人移居美国，这些同乡仍然住在这里，并负责照看整理“种能洞”的环境，直到前几年这些老人去世。2004年

山旧属介绍，为了防止外来势力的攻击，“种能洞”的屋顶、外墙都留有机枪射击口，窗户内外侧都加装钢板。“种能洞”居高临下，是绝佳的军事要地，房子的砖墙和楼板进行了加厚处理，一般的机关枪子弹是打不透的，整个建筑物普通大炮也炸不坏。阎锡山之所以这么做，既为防外，也为防内，怕蒋介石对他下手。整个房子只有五个

房间，包括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建设之初，这里不通水电，吃的是自己打出的井水，用电则是靠一辆淘汰的旧卡车发动机发电，一直到1954年才正式通电通水。阎锡山就是这样一个人，风光无限时，享尽荣华富贵；身处低谷，也能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继续存在。台湾作家李敖曾到“种能洞”采访阎锡山，看到他最后的生活状态，遥想当年“山西王”之威风，禁不住感叹阎锡山“能伸能屈”。阎锡山的子女后代很多，却没有留在台湾居住的，他在世时就把孙辈送到美国读书，由此可见阎锡山对于离开故土的内心矛盾。

在山西省定襄县城东北22公里的河边村，现在被定名为河边民俗馆的阎锡山故居，依然保存完好。这座始建于1913年，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才完工的豪宅，相比台湾的“种能洞”的门可罗雀，这里可谓“热闹非凡”。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前来游览，仅门票每客50元的收入，足以维持全部所需开支。当年，蒋介石、冯玉祥都曾在这里住过并品尝山西丰富多彩的面食。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率领共产党的大队人马“进京赶考”，路经这里，也曾借住几日。他们就是从河边村阎锡山的家一路东去安营西柏坡、进驻北京城的。

岁月在蚕食着人们的记忆，历史在风雨飘荡之中老而弥坚。从河边村到“种能洞”，阎锡山的岁月过去了；从“种能洞”再到河边村，刻在岁月上的历史清晰可见……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，出版作品多种)



【舜天鲁地】迷路

□李亦

沿着那条路往山上走，我与妻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停下回望村庄，这确实不是原来的村子了。原来的村子全是平房，现在差不多都是三层楼。

乡野是人类的子宫，住在水泥墙内的城里人总会无端怀恋。幸好乡下大都有亲戚，隔三差五地走一趟，彼此都满足了某种心愿。

山那边的亲戚家有一大片果园，每年从树枝抽芽到果子收摘，我们总要去几趟。果树虽不是我栽种，但看着果林变绿、开花、结果，心里却有了异常的美意和神秘感。这神秘不与别人说，别人会用植物的光合作用原理帮我解释。这样的解释无法解开我心里的谜团。自然界包含无限的神性，神性是无论多么发达的科学也说不清的。

走在乡下，记忆中的参照物都来自自然，一道坎、一棵树、一潭水，都会自愿为你引路，你的方向错不了。进了村，那参照物多半来自房屋。村里的房子随时光老旧，渐渐也成了自然的一部分，甚至卧在张家门前的狗、王家墙角的鸭与上次相见时也无大变，只是摇头摆尾更加缓慢，渐添老色了。

可没想到，这一回却迷路了。在那条不知道走过多少次的路上却找不到亲戚的大门。沿着那条路往山上走，我与妻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停下回望村庄，这确实不是原来的

村子了。原来的村子全是平房，现在差不多都是三层楼。说那些房子是楼房有些勉强，只见在各家房顶上长出了房子模样的粗陋洞壳，大块轻便灰砖摆积木一样叠加起来，组成大小不等的框架，没有钢筋，也不用水泥，石灰黏合。门窗是空的，墙体不但透风还透阳光，大雨是挡不住，小雨也会透到里面，幸好上面压了些水泥条板，否则大风一吹都会散了架。

从前宅子之间的那些空地，也都生出了这种叫做房子的全无居住意义的建筑物。放眼四望，到处是难看的新墙和建筑垃圾，街上淌着脏水，烂菜叶，破衣服随处可见。这不是原来的村子，这不是原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地方。或许这将成为一个没有历史意义的遗迹。

亲戚告诉我，建这些东西全是为了拆迁。有了这些临时建筑，拆迁面积就会大大增加。亲戚家的村子本是窝在山坳里果园的一部分，如果拆迁，果园和绿色将不复存在。即便这样弄假得利，村民对拆迁也还是不满。他们不愿意把耕地变成那种像房子的建筑，更不愿意把自己的村子变成城市，即便拆迁可得到高楼的一套或几套单元房也高

兴不起来，因为从此他们就要告别土地了，而土地不仅是他们谋生的资本，还是他们的最好归宿。失去了土地，他们也将失去所有依傍。可他们挡不住城市化进程的步伐。

一想到拆迁，就不寒而栗。一个一平方公里的村庄拆建，就会带来数平方公里持续几年的扬尘和噪声。原因很简单，拆迁就是把房屋变成垃圾再在垃圾堆里建造新房的过程。这个过程能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言自明，可我们的城市建设正全面开花，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。植被和绿色从城市边缘向后一退再退，大山挡不住，森林挡不住，河流挡不住，乡野日渐稀少。持续不断的扬尘最终累积成了可怕的霾，持续不断的噪声最终让一个个大脑失去了安宁。

在房顶上加盖两层像房子的东西，面积在五百到一千平方米之内，需要水泥沙子砖瓦等建材十几卡车，运输造成的污染和噪声已经很难让人忍受。但这也是污染和噪声的开始，更严重的污染和噪声还在后面，运进来安装到房顶上的这些材料，只是摆摆样子，用不了多久，大型挖掘机就会像捣蒜一样把它们捣碎，

面对我的疑问，亲戚沉默了一会儿说，不造假谁还去求他们？送少了也不办事！我无言以对。我们社会的许多顽疾都是根深蒂固的，想一朝铲除谈何容易！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，本名李传敬，代表作有《药铺林》、《双凤凰》等)

一万多年前，我们的祖先从泥土烧硬定型而发明了陶器，其后陶器的制作历经泥条盘筑和轮制成型，又由堆烧、穴烧到窑烧，制作方法和工艺水平不断提高，器物器形也日益丰富多彩，其中有碗、盆、釜、瓶、甌、壶、缶、瓮等生活用陶器，也有砖、瓦等建筑用陶器。随着选料和制陶技术的进步，原始瓷器在商代开始出现，到东汉中晚期，开始出现瓷胎坚固、釉层光亮、高温烧成的真正瓷器。此后，中国古代的陶瓷历经唐宋元明清而蔚为大观，如唐代的唐三彩、秘色瓷，宋代的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五大名窑，明代的宣德窑、成化窑，嘉靖窑，清代的郎窑红、粉彩器、珐琅彩等。这些陶瓷有的造型奇特，令人称奇；有的质如美玉，晶莹剔透；有

【艺术世界】

陶瓷中的传统文化元素

□李绍强

的色彩斑斓，艳丽无比。这些都为中国成为“瓷国”奠定了基础。陶瓷本来是为实用而发明的，但随着质量的提高，其观赏性和艺术性日益增加。

随着陶瓷功能的扩大，其逐渐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成为重要元素构成的一部分。早在汉语中，制陶由原始社会产生的手工技艺，历经数千年生活中的使用，逐渐与道德教化、安邦治国、人格修养等概念相联系，成为语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《史记》记载邹阳上书梁孝王，认为“圣王制世御俗，独化于陶钧之上”，意即治世要像陶轮转动制陶那样有控制力。又如《汉书》记载董仲舒的对策，认为：人性修养如同制陶，“或仁或鄙，陶冶而成”。社会风尚“犹泥之在钩，唯甄之所为”，需要上层的引领。《后汉书》记载郅恽上书，认为天地“含元包一，甄陶品类”，即天地造化品物，如陶匠之成众品者。如《史记》记载匈奴特点是“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，其困则瓦解云散”；《汉书》记载伍被劝说淮南王，认为秦末暴虐，天下大乱，“百姓离心瓦解”，应引以为戒。《明史》记载元朝末年李善长面陈朱元璋，认为“元纲即紊，天下土崩瓦解”，可取而代之。

在文学方面，陶瓷从生活用品到艺术品，渗透到古人的生活中，上至皇帝下至臣民，无不通过诗词歌赋，表达对陶瓷的喜爱。如西晋杜预《茹赋》：“水则砥方之注，挹彼清流，器择陶拣，出自东瓯。”晋人潘岳《笙赋》：“状黄色以授甘，倾缥瓷以酌醕。”唐代杜甫《又从韦处乞大邑瓷碗》：“大邑烧瓷轻且坚，扣如哀玉锦城传，君家白碗胜霜雪，急送茅斋也可怜。”；宋代苏东坡《试院煮茶》：“蟹眼已过鱼眼生，飕飗欲作松风鸣。……潞公煎茶学西蜀，定州花瓷琢红玉。”元代吴莱《观唐明皇羯鼓录后赋》：“上皇天宝全盛年，花奴抱鼓踏御筵……宋公守正好宰相，鲁山花瓷闻献研。”明代王维《黄广文席上咏白瓷杯》：“愁把相逢一笑开，广文今夕试新杯。浅深自是甄陶出，制作应从模范来。”王世贞《用晦寄四种杯仍系以诗走笔二绝为谢》：“饶瓷宣碗白于霜，鹦鹉螺兼翡翠觞。我欲接来成一钵，大罗天上贮三浆。”乾隆帝则有歌咏哥窑瓷枕、蟾蜍砚、钧窑碗、无当尊、花瓷灯等诗词几十首。

在艺术方面，陶瓷构成的雕塑是最主要的代表。陶俑自诞生起，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氛围。从祭祀神灵和祖先到殉葬明器，充斥着原始意义的祖先与神灵崇拜。陶制雕塑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，却又与儒、释、道及各种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大量孔庙、佛寺、道观、祠堂以及各类神祇建筑中的塑像，包括圣贤、菩萨、神仙、英烈和各类神灵，使人们的思想意识、宗教信仰和对祖先的追忆物化为偶像崇拜，陶瓷成为连接精神与物质的纽带，以此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求。据统计，唐宋以来全国每个县几乎都有孔庙、佛寺、道观、土地庙等，祠堂更是数众多，因此陶瓷塑像数不胜数，成为中国古代的一大奇观。宗教信仰与思想意识促进了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，也将无生命的陶瓷与令人敬畏的历史人物和宗教代表完美结合，使之成为传统文化元素中的明显符号。

陶瓷从实用品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，糅入了大量优秀文化元素，集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历史为一身，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记忆和民族符号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作为其中的一部分，中国陶瓷无论是外形还是内涵，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，因此，深入研究其构成和影响，显得尤为必要。

(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)